

17.12



革命回憶錄

4

封面题字：饶正铎

校 对：郑风云

革命回忆录 第四辑

编辑 中共鍾祥县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
印刷 湖北省鍾祥县印刷厂
印期 一九八四年十二月

(内部资料)

革命回忆录(4)目录

北山纪事·····	谢 威(1)
北山地区的农民运动·····	张恒丰(18)
北山革命斗争概况·····	廖东洲(22)
忆襄西革命斗争	
抗日武装斗争的准备·····	刘 真(26)
襄西抗日根据地的建立·····	李炳南(31)
坚持襄西·····	洪 范(42)
巩固发展抗日根据地·····	刘 真(47)
战略撤退·····	刘建章(55)
建立在敌人心脏的堡垒·····	章惠民(58)
重建襄西根据地·····	张明卿(67)
峥嵘岁月·····	朱哲平(72)
镇西县党政军组织情况·····	刘建章(87)
进军石碑·····	毛 凯(90)
北山抗日烽火·····	王子才(94)
白云深处红旗飘·····	杨厚卿 易协卿(105)
抗战时期荆北特区的斗争概况·····	赵武子 孙玉洲(113)
心中燃起复仇的火焰	
——忆立达小学给我的革命教育·····	孙立平(122)
北山人民 坚持有功·····	严世柱(126)
解放战争时期北山根据地的斗争·····	乔先义 孙海门(131)
北山坚持时期的几个斗争片断·····	刘光直等(141)

扁担伴随我战斗.....	胡传汉(145)
重返中原 开辟襄西.....	徐 蓬(149)
一支活跃在北山乡村的农村剧团.....	孙立平(164)
江山尚在 松柏犹青	
——忆张明沮烈士.....	胡传汉 严传梅(166)
硬骨钢铁汉 血洒碾盘山	
——忆许世雄同志.....	胡传汉(169)
刘真同志日记摘抄.....	(173)

北山纪事

谢 威

我生在锺祥，但我的革命生活却是在荆门开始的。从那时起，在我们党发展的前四个历史时期里，我都先后来到荆门，和这里的同志们患难相依，生死与共，度过了血与火的二十四年，迎来了全国的解放。今天，和同志们一起，欢庆我们党的六十三岁生日，并与当年风雨同舟，和衷共济的老战友们欢聚一堂，畅叙往事，感到分外高兴。现在，我仅就记忆所及，把当年和北山战友们一起并肩战斗的经历和我所见所闻的北山人民在革命战争年代可歌可泣的事迹写出来，以之告慰在斗争中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献出了自己宝贵生命的战友们。

一、一九二五年，我十六岁的时候，家父谢海如为了谋生，执教于马良福音堂小学。我随家父就读于该校。那时，学校里有一位老师叫邓秉纯。他的社会职业是传教士，实际上，却是一个老共产党员，后来担任过党的荆门县委员会委员。接触中，他见我思想活跃，勤学好问，便把我介绍给当时的马良私立蚕桑学校的校长李廷璧。李廷璧也是一位优秀的共产党员，他以蚕桑学校为掩护，在积极进行着革命活动。经邓秉纯介绍，他就成了我走上革命道路的启蒙老师和带路人。那时候，这个地区还是北洋军阀统治，马良驻军属

襄阳张连升部，连长姓鲍。这些匪徒们嗜杀成性，每天都在杀人。受害者以小江湖人为最多。小江湖有一批教友，有的家人被捉，便跑来求邓秉纯去向匪徒们讲情。另一传教士吴天尧也帮着来人向邓诉说：“他们都是我们的教友，都是好人。”我也看出这些人善良正直，勤劳朴实，决非他们所讲的“坏人”。对他们的遭遇我十分同情，但又无可奈何，便去向李廷璧发泄我对匪徒们的愤慨。李廷璧向我解释说：这些军队都是帝国主义在中国的走狗，他们是维护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利益，镇压中国人民的刽子手。由此，他便讲到阶级，阶级压迫和阶级斗争。在谈到教会时，他说，上帝和神仙本来是没有的，是统治阶级用来桎梏人民思想的一种精神枷锁。和尚、道士、传教士是统治阶级用来麻痹人民革命斗争意志的帮凶。他还用《国际歌》的歌词教育我，使我初步懂得了谋求人类的解放，“全靠自己救自己”的道理。他又介绍我阅读《独秀文存》，高语罕的《白话书信》等进步书籍。在谈到当时的时局时，他告诉我，现在中国已经有了一个真正的革命组织共产党，共产党完全是代表中国人民利益的组织。还说，广东省已经有了共产党领导的军队，不久就要打到湖北来，消灭军阀走狗，打倒土豪劣绅，解救这里的人民。他就是这样孜孜不倦，循循善诱地把我这个无知的少年引上了追求真理，向往革命的道路。

二、一九二六年，我们家乡——鍾祥南区——的农民运动蓬勃兴起，我积极地投入了这场革命。一九二七年，我被选为鍾祥南区农民协会委员长，成了驰名南区的左倾分子和“暴徒”。冬，共产党人、黄埔学生严子汉、罗汉二同志，参加潮汕暴动失败后，接受党的派遣，从广东回来。因不了解家乡情况，走到鍾祥南区，知道我是共产党员，便跑来找

我，我把严子汉安排在我家，把罗汉安排在武志靖家暂住。当时，我和武志靖都是南区特支的主要负责人，向他们二人详细介绍了荆门情况，并帮助他们和荆门的党组织取得了联系后，他们就回到北山，严子汉去了胡家集，罗汉则去雨林庙活动。年底，他们给我一信，大意说，“这里生意很好”。我才知道他们已经站稳脚跟，打开了局面。

一九二八年，严子汉在胡家集发动了一场武装暴动，当地土劣对他恨之入骨，便跑到荆门去告他的状。荆门的官员们慑于革命运动的威力，不敢受理，土劣们又跑到钟祥去告他，并发动他们在南京、武汉的代理人对钟祥施加压力。钟祥县便派人捉走了严子汉，并杀害了他。暴动失败了。为了逃避敌人的摧残，参加暴动的一些同志跑来南区找我，廖东洲夫妇等也在这时来到我家，我把他们一一安顿下来，直到局势好转后才离开我处，重返北山工作。

三、到了一九二八年，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和地理上、政治上的原因，荆门、钟祥名义上是两个县，实际工作却是一体的。起先，钟祥县的党组织有三个来源：一个是由鄂北特委派来的张继襄掌握，魏恒久为书记的河西特支。这个特支以大庙集为中心，包括荆门城以东、襄河以西的这一大片，二是省委派来的特派员周铎领导的东区特支，以皇庄庙为中心，包括城东、东桥、黄家集等地；三是我们南区特支。他们两个特支都属鄂北特委领导，我们南区和荆门都属鄂西特委领导。一个县分属两个特委，工作也不协调。为了统一领导，一九二八年春，李廷璧代表鄂西特委，在文大庙集魏恒久家召开会议，把钟祥三个特支统一起來，成立钟祥县临时县委。属鄂西特委领导。如果按照工作能力和在党内的威望，县委书记应由李廷璧担任。但当时在“左”的组织路线

影响下，唯成分论盛行，认为知识分子不能担任党的主要领导职务，所以县委书记选了魏恒久，李廷璧担任县委书记。虽然如此，在工作上和政治品德上，李廷璧始终都是受到同志们的尊敬的。此外，县委成员中还有张继襄（组织部长）、罗伯南（宣传部长）、沈明纪、郑家坤、陈志君和我。我除了担任少共县委书记外，还主持南区工作，经常在冷水铺、艾家山、潘胡、东巩、栗溪、双河、上胡家集一带活动，叶云、张保仁、严济光、丁连山、任岐山、徐瑞棠他们家成了我常来常往的地方。为与荆门南区区委联系工作，我还常住汤和清家，杨家集、张维成家我也住过两夜。因此，我当时既是鍾祥的干部，也是荆门的干部。

四、一九二九年，荆门在几次暴动失败之后，组织遭到严重破坏，干部受到很大损失，荆门县便分成了两部分：南部以沙洋为中心，成为县委的根据地。县委书记陶章同志以卖布为掩护，在沙洋活动；北部则暂委托鍾祥县委代管。我们鍾祥南区把赵月楼的枪拖出来，成立了南区游击队，主要活动在鍾祥南部和北山。这样，我走遍了北山大部地方，几个区的主要干部、甚至每个支部的支部委员我大都熟悉。荆门好多同志都参加了我们南区工作。我们两县的县委也经常在一起活动。当时，我们的党处于新建阶段，还不成熟，许多革命的理论问题还没有弄通，实际中碰到的许多具体问题也就难以得到合理的解决。反映到我们荆鍾两县工作的就有几个急待解决的具体问题：

第一，关于暴动问题。那时，上级一再指示、甚至再三催促我们“立即组织暴动”，提出了“有一动一，有二动二”的极左口号。而荆门在几次暴动之后，遭到敌人残酷镇压，组织破坏严重，干部损失极大，群众四处逃难，立足之

地尚且难得，哪还有力量举行暴动？如果硬性执行上级指示势必导致继续失败。但如不举行暴动，又违反了上级指示，违反了组织原则。对此，锺祥县委进行过讨论，讨论中，李廷璧、魏恒久、郑家坤、陈志君等同志和我，主张暂不举行暴动，保住元气，把主要精力用于发动群众，控诉敌人的暴行，反对清乡，以利组织的巩固和发展。少数县委，则主张按上级指示办事。两种意见相持不下，只好付诸表决，表决结果，暂不举行暴动。于是，县委在一个时期里，把主要精力用于发动群众，反对敌人暴行，整顿、巩固和发展组织，避免了不应有的损失，工作上大有起色。不久，鄂北特委又催促我们立即组织暴动，否则就是“右倾机会主义”。县委内部又发生了争论。因此，举行不举行暴动，成了摆在我们面前的头号大事。锺祥如此，荆门也一样。

第二，几个策略问题。当时受“左”的影响，党内长期流行着一个口号叫“有土皆豪，无绅不劣”。对地主，不问守法非法，都一律打倒；对地主与富农不加区别。不少地方出现了侵犯中农利益的现象。对城市居民、白区群众，都当成“坏人”，使城市居民和白区群众都害怕我们，造成严重的“城乡对立”和“赤白对立”。把被捕后释放回来的人都当成“反水分子”，把小商小贩也看成“资本家”。此外，对土匪、帮会、道门、知识分子，……等等态度问题，都没有得到合理解决。结果，自己孤立了自己，走到哪里都是“敌人”，给工作带来了严重损害。县委中，以李廷璧为代表的一些同志如郑家坤、沈明纪、魏恒久、陈志君、童子浩等同志和我，都主张必须讲究策略，区别对待。但也有的同志认为这是“右倾”。县委中存在着这种认识上的分歧，不可避免地阻碍了革命运动的发展。

第三，武装建设问题。我们把赵月楼的枪拖出来，建成锤祥县南区游击队，本想以北山为中心，创建一块红色根据地。但在具体作法上发生了分歧：一种意见主张多搞几个点，，巩固后再把它联成一片，造成一个较大的局面；另一种则要求先巩固好自己那个点，然后再开辟其它地方。

这是当时关系到荆锤两县革命前途的三大问题，必须及时解决。正好这时鄂西特委决定召开全区第二次代表大会。通知锤祥县委选派两名代表参加。接到通知，荆钟两县县委在冷水铺郑家坤家举行了联席会议。出席这次联席会的有魏恒久、李廷璧、沈明纪、张继襄、罗伯南、郑家坤、陈志君、张琢成、丁连山、吴觉民和我。会议决定我和魏恒久两人代表锤祥县出席这次大会，并把 we 存在的以上三个问题提交大会解决。荆门与会同志也委托我们把这些问题提向特委请示。临行，荆门同志特地为我们赶制了一身新棉衣，为我们准备了旅费干粮，由吴直夫领路，从郑家湾向洪湖出发。第一天宿吴直夫家。第二天，他又派人送我们化装进入白区，通过沙市，几经周折险阻，才到了洪湖。

这次大会期间，我们见到了鄂西特委书记周逸群同志，当我们向他汇报了荆锤两县的工作，提出存在的那三个问题之后，他十分热情地肯定了我们的工作，并指出：（1）荆锤两县暂不举行暴动，把主要精力用于发动群众，恢复和巩固组织工作。（2）区别对待，争取多数的认识。（3）打开局面，造成一个小区的武装割据的思想，都是正确的。周逸群同志的指示和大会决议，给了我们很大鼓舞和信心。大会结束后，又经过近两旬的跋涉，通过敌人的重重封锁，才回到了我方控制的郑家湾，在郑家坤家召开了锤祥县委全体会议。荆门县委丁连山、吴直夫等同志也参加了此次会

议。会上，由我传达了二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和周逸群同志的指示。同时，经县委研究，对大会决定的三大任务作了部署：

1、广泛开展宣传鼓动工作，大造革命声势，由张继襄起草了一个《告荆钟两县人民书》，拟定了几十条标语，要求在七天之内贴满全县的集镇农庄，连县老爷的大堂上也要贴上。否则，开除党籍。

2、选择最反动的分子杀他几个。如不能公开进行，组织暗杀也要完成任务。

3、调整部署。把钟祥南区（包括南部京山的大部）和北区公开，造成苏区。对于北山，暂时维持灰色局面，以后，根据形势的发展，再决定是否公开。对于大庙集、陈家集、盐池、塘港、石牌等地，仍保持外白内红的两面政权。因为这里的区团董、区长、保董大多是我们的党员或党的同情者，基本上是按我们的意图办事的。把县委机关设在这里，便于掌握全县，使南区、北区、北山互相配合呼应。这一部署，从荆钟两县的实际出发，无疑是正确的。

五、一九二九年——一九三〇年之交，为贯彻二次代表大会决议，我到沙洋与荆门县委书记陶章商量关于建立中国工农红军荆钟京天潜游击纵队的问题，商量结果，决定这支部队由以下三支武装组成。

一支，把钟祥游击队和荆钟两县各区现有武装全部集中起来，编进纵队。这部分战士成分好，党员多，经过较长时间的考验，政治素质和军事素质较好，编进纵队各部作为骨干；

一支由荆钟两县县委派得力干部打入土匪李凤山部，帮助黄光柏、李庆春把他们策动的人枪从该部拉出来。

一支由李廷璧去京山策动该县保卫团之一部武装起义。

原来，敌京山县长孙恒是一个党的同情者（据李廷壁讲是一个党员），与李廷壁十分友善，他作为县长，掌握着京山的军政大权。县保卫团的三个中队中，他有把握可拖出一个半中队甚至两个中队。

后来，这一计划执行的结果，第一、二两支成功了，第三支出了意外。李廷壁到京山，担任了县委书记，在策反过程中被叛徒秦帮焯、顾贵良等杀害。京山保卫团中起义的部队与敌曹振武部遭遇，被打垮了。

黄光柏、李庆春从李凤山部策动起义的部队到达沙洋附近，陶章派我传达命令，调这支部队攻打马良。那时，马良敌军内部有一个班长和几名士兵是党员，荆门县委策划好等我军一到，里应外合内外夹攻，攻下马良，以壮大我军声势，鼓舞军民斗志。可是，这支起义部队人数虽有两百多，但成分复杂，军纪涣散。光是马就有一百多匹，每人都有一只手电棒，不少人还带有家属。行动起来，人嗜马嘶，灯火通明，未到马良，敌军就被吓跑了。等到发起进攻，已是一座空寨。此时，沙洋之敌又向我扑来。幸而我们事先在襄河上准备好了几十只木船，使部队及时撤出马良，安全转移到了河东。过河后，马良敌军一个班起义归来，行至罗汉寺附近，遭反动民团汤天山匪部袭击，全部被害。

一九三〇年初，各部按计划到南区集中，我中国工农红军荆钟京游击纵队正式建成。纵队建军时共七百多人，步枪一百多条，其余是大刀长矛、土枪土炮。政治上，只有张觉非、罗汉所带部队是可靠的，另一大队人数不少，但特务、惯匪、第三党、改组派……什么人都有，军纪也不好。不久，上级派罗正品来整顿这支部队，他把部队集中到聊岷山附近的张家岭整训，在盘石岭杀掉了匪性不改的毛营长、索连

长和一些特务、异己分子，经一个时期的整训，部队素质有了很大提高。此时，国民党军想把我们压到罗桥一带一鼓全歼我军，我军发现后，立即转移到了襄西。在襄西，因部队庞大，目标显著，到处碰壁挨打，战士们疲于奔命，士气不振，死的伤的患病的时有发生。不久，部队只剩下了一百多条枪、两百多人。一九三〇年六月，红二军团攻下沙洋。七月，黄光柏请求把荆钟京游击纵队和当地参军的四五百名战士一起编入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军团。

六、土地革命时期，荆门孙小平是一个有威望的大绅士。上自官、商，下至贩夫走卒，荆门各阶级、各阶层的代表人物都直接间接与他有来往。他精通文史，写得一手好字，从年轻时起就在家设帐课徒。到了这时，已算得荆门的一位名儒了。不少荆门的党政军商的显要都出自他的门下。他和他的兄弟孙石平、孙恒平、孙××一起，人称“四孙”成了荆门县举足轻重的权贵。政治上，他们当然是扎根于旧的统治机器和豪商巨贾的，黑社会的帮会、道门，都承仰他们的鼻息，连县太爷都要看他们的颜色行事，可见其气焰之盛了，对于革命，一般地说，他们并不反对，孙小平的儿子孙念祖在大革命时期还是一个党员，斗争中表现还是较好的。当时，县委认为，如果能争取他们的支持，至少能使之保持中立，对我们的工作是有利的。因此，县委早就密切注视着四孙的态度了。孙小平有个佃户叫张成华，很得他的信任，是一个地下党员。为了掌握孙氏的动态，荆门城地下党支部通过张成华，把地下党员胡家武、李光华推荐给孙小平家帮工。另外，地下党员廖东洲、陈炳汉是他的得意门生，经常出入孙家，还有吴觉民、吴开福等同志，与他也有瓜葛，过往亦甚密切。因此，孙家的一举一动，我们都了如指

掌。

一九三一年，我担任鍾祥县苏维埃主席（即后来的县长），党内担任县苏党组书记、军事部长、青年部长和少共县书等职务。四月，为了争取孙氏合作，县委派我化装进城，与孙家谈判。在我进城之前，地下党就作了周密的保卫部署。那天，我由地下党员代帮宪引路，混进荆门，到十字街响井对面孙小平家（即今市委大院），与孙石平谈判，不知怎地走漏了风声，敌人发现共产党的县长进了城，马上四门紧闭，全城戒严，派人到孙家抓我，敌人刚走到孙家门前，放风的李光华就大声和他讲话，发出信号，胡家武听到暗号，拉着我就走。敌人进大门，我出后门；敌人开始搜索，我正攀住他家后园的一根粗实的葡萄藤往城墙下坠。等到敌人清醒过来，我已由代帮宪向导，越过牯牛滩，离城数里了。开始，我们以为这是孙家捣鬼，后经查证，此事与之无关。此后多年，在许多工作中，孙家还是与我们合作的。通过这事证明，当时，“统一战线”这个词虽未提出，更未形成党的政策，但荆鍾两县县委还是自觉和不自觉地在在这方面作了许多工作，也是有成绩的。

七、一九三〇年八月，红军打下沙洋，周围的群众看到自己的队伍打了胜仗，以为革命已经胜利了，家乡已变成了赤区，高兴的不得了，有的人还杀猪以示庆祝。不少群众自发地跑去分地主的财物。当地党组织也决定在邓家湖举行暴动，但我认为红军打下沙洋已经两天了，敌人早已跑光，再暴动已抓不住敌人主力。且红军打下沙洋后可能还要走，不一定能把这里造成赤区。所以和荆门的丁连山、吴直夫等领导同志们商量，建议暂不举行暴动，让已经暴露身份的同志参加红军，其他同志仍保持灰色面貌，继续深入群众，巩固

和发展组织。我的建议没有被他们接受，还是在邓家湖举行了暴动。为此，我十分着急，便去沙洋找段德昌。段带我去找邝继勋，邝又带我去见前委书记周逸群和红军军长贺龙，请求他们支援地方，巩固暴动成果。他们几位领导向我解释说，部队还有更为重大的任务，必须马上开拔，不可能常驻沙洋。至于什么重大任务，他当时没有讲，后来才知道是中央代表柳直荀(柳克明)已到红三军，催促红三军兼程南下，攻打沙市。得手后再急驰岳阳，配合中央红军攻打长沙。因此，他们几个人建议我们赶快组织群众撤退。

我离开部队去邓家湖找到丁连山、吴直夫、邓秉纯、邓念银、杨楚柏等同志，通知他们说，部队马上就要出发了，我们必须组织群众迅速撤退。这时，邓家湖、小江棚已集中了成千上万的群众，敌人又正向这边扑来，情况十分危急。我们商量把群众分成三路撤退：

一路由我带队，渡河向东，到鍾祥南区隐蔽休息。

一路由丁连山、吴直夫带领，撤至北山隐蔽。

一路由邓秉纯、邓念银带领，向大庙集方向撤退。

此时，敌人前锋已接近我们，我带领一部分武装和三十多名群众，一面阻击敌人，掩护另两路撤退，一面交替向河边转移。最后全部渡过襄河，到了南区。我把群众安顿之后，马上渡到河西，检查另两路撤退情况，见人都没有了，以为他们已经安全转移，也就回到了南区。后来才知道，丁连山、吴直夫那一路并未撤走，当敌人接近邓家湖时，他们以为和往常一样，到芦苇林里躲一躲，等敌人一过也就没事了，所以把群众带进了邓家湖芦苇林。哪知敌人一到，就发现了他们，一把火烧向芦苇。秋天的柴山，风助火势，火仗风威，真所谓干柴烈火，几十里外都看到熊熊火焰，滚滚浓

烟。火烧、水淹，加上敌人疯狂的扫射，群众被害者数以百计。邓家湖暴动彻底失败了。

八、一九三一年八月中，红九师驻下胡家集，我和从鄂北来的张旺午到胡家集见到了万涛、段德昌、陈培英等领导同志，荆门县委吴觉民同志也于此时和我们一起来到九师，由我代表两县县委，请求部队支援地方，攻打鍾祥，并建议打下鍾祥后，创建荆鍾京天潜苏区，与襄枣宜联成一片，进而向东发展，与鄂豫皖苏区相呼应，形成对武汉北面的战略包围。对于这一建议，万涛、段德昌同志说，他们也有这一打算。但现在必须尽快去鄂西北接应七师、八师，然后，才能考虑这一方案的执行。于是便把我和吴觉民留在九师，随军北上仙居、刘侯集、枣阳、宜城、南漳等地。九月底又回到刘侯集，与七、八师会合。行军中，我们沿途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田地，支援地方建立苏维埃政权、创建地方武装，发动成立各种群众组织等作了不少工作。

九、一九三一年十月二日，红三军攻打鍾祥城，不下，四日，撤离鍾祥，经旧口、下洋巷、永隆，去了潜江。

红军撤离鍾祥时，留下一批武器。吴觉民利用这批武器，组织成了北山游击队。

红军一走，敌人对鍾祥全境进行了残酷围剿、清乡，我们的工作受到了严重损失。

一九三二年春，鍾祥县委在双河口召开全体会议，专题研究了鍾祥的工作，决定：

- 1、整顿巩固党的各级组织；
- 2、举行宣传周，大造革命声势；
- 3、镇压反动分子，打击反动政权，开展苏维埃运动。

一九三八年冬，我在京山特支工作时，根据鄂中特委书

记杨学诚同志指示，到鍾祥城中果园参加鍾祥县委书记刘慈恺同志主持的县委全体会议，向会议介绍了鍾祥县土地革命时期的情况，并对今后的工作提出了建议。

十、一九四六年秋，我在京鍾处理了中原突围前后的许多问题后，只身化装到了武汉，准备去华北或者苏北。可是一到武汉，陈大姐就派张义在我哥哥谢敬止同志处找到我，命令我留在武汉，工作听候指示。那时候，武汉到处都是五师留下来的人。车站、码头、大街、小巷，到处可碰到熟人，一见面就热乎得不得了。还有的人，不知怎地知道了我的住处，竟跑来找我。一进门就是“专座，你是我的领导，我只有找你。”有要求安排隐蔽的，有要求设法转移的，有要求承认关系的。可是，我手中一无干部二无钱，又没有一个联络站，特别对他们目前的政治面貌不了解，根本无法，也无权解决这些问题。再想到流散武汉这么多人，东游西逛，弄不好会出大乱子。以此我感到十分危险，心情很是沉重。正当这时，上海局派李星来找我，通知我去上海开会。于是，我就到了上海，见到了上海局常委、我们五师的老同志张执一。我把武汉的情形向他汇报后，他说：“武汉的情形，我们早已知道了，你先住下来再说吧。”

那时候我患了感冒。为了治病，更为了安全，执一同志把我安排进了李伟光医院。这是一所私人医院，院长李伟光是个特别党员，医院工作人员李伟光的妻子、姨妹都是我们的人。住在这里很安全。不久，李云程、李蔺田也住进了这家医院，李炳南也是在这里见到的。原来，李炳南早就到了上海。他来上海后，曾被分配去天目山打游击。可是他对天目山的环境不熟悉，人也不认得，最头痛的是语言不通，简直无法工作。于是，他又回到上海，等待分配工作。